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2.008

■ 政治哲学

国家与社会历史纵轴中政治认同的生成考察^①

曾楠

(南方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15)

摘要:管窥东西方历史, 国家与社会的历史纵横总体呈现同构一体、有限分离、有机互动的变迁历程, 考量政治认同的三个界面, 即个人特性的自我确证、他者世界的承认归属、权力权威的遵从信任, 政治认同相应呈现附魅与混沌化、出场与宰制化、内生与有机化的表征。从“谁之认同”的主体探趣, “非我”——“自我”——“他我”是其认同表征的相应的主体样态。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 历史纵轴; 政治认同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2-0042-07

Considerations on Political Identity Generation in the Historical Longitudinal Axis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ZENG Na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Abstract: Glimps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history, the historical longitudinal axis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general aspect presents isomorphic one, limited separation, and organic interactive course changes. Considerations of political identity of the three interfaces, namely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elf-assurance, the recognition attribution of otherness world, compliance and trust of the power authority, political identity correspondingly presents enchantment and chaos, appearance and domination, endogenous and organic. From “whose identity” exploration interest, “nonself”——“myself”——“him I self” is the appropriate characterization of its main identity like state.

Key words: state and society; historical longitudinal axis; political identity

“认同是在时间变化中的认同。”^[1]伴随着人类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 从尚武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圣西门)、从共同体社会到利益社会的转化(滕尼斯), 从自然经济社会与货币经济社会的转身(齐美尔)、从巫魅化社会与祛魅化社会的转向(韦伯), “我是谁”“我们是谁”等认同困惑更是推向了历史的前台。然而如托马斯·卡莱尔所言: “过去是一个世界, 而不是一片灰色的混沌。”^①管窥东西方历史, 国

① 收稿日期: 2013-09-10

基金项目: 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CKS013);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GD13YMK01); 2013年度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一般项目(2013ZY003)

作者简介: 曾楠(1986-), 女, 江西吉安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认同理论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

①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 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 著有《法国革命》等书。

家与社会的历史纵横总体呈现同构一体、有限分离、有机互动的变迁历程,考量政治认同的三个界面,即个人特性的自我确证、他者世界的承认归属、权力权威的遵从信任,政治认同相应呈现附魅与混沌化、出场与宰制化、内生与有机化的表征。从“谁之认同”的主体探趣,“非我”—“自我”—“他我”是其认同表征的相应的主体样态。

一 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政治认同的附魅与混沌化

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顾名思义,国家即社会,社会即国家,二者是融合为一与互为一体的。考量西方社会古希腊时期、古罗马时期、中世纪国家与社会的演绎变奏,大体上经历了“一体复合—初步划分—‘二元’雏形”的变迁历程,但总体上仍未跳出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的模式范型。东方社会君主专制时期、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国家与社会亦是同构一体的历史印证。

考察西方社会发展史,作为政治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时期城邦生活与社会生活是合二为一的,公民把“对自己私事的关心同参与公共生活结合起来了”^{[2]34}。亚里士多德对人的研判即“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3]4},更是对古希腊时期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生活写实的经典隐喻。古罗马时期当小国寡民的城邦扩张成为一个地域庞大的世界帝国时,城邦时期的存在方式已难以适应,国家与社会关系有所疏远,法律成为国家治理的必然产物,如西塞罗所言,国家是“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4]39}。然而《罗马法》的实行即隐喻国家与社会的初步分野,国家依法行动,社会则依靠道德、传统、习俗等力量治理。历史步入漫长的中世纪,当基督宣布“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时,“属灵的王国”与“世俗的王国”分立,二元分野的雏形即告形成。精神领域归教会管、世俗领域归国家管,国家与教会将人牢牢地固定在无自主、无自我的坐标系中。然而需要指出,中世纪教权与王权的二元分野并非国家与社会的有限分离,此二元非彼二元,中世纪的二元观念仅仅是为国家与社会的有限分离提供了理论资源,正如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沃特金斯(Frederich Watkins)指出:“在西方教会与国家本是分立的制度,传统西方文明便运用于社会二元论的基础之上;如何以纯粹世俗制度为基础,保存这一二元体系,便成了现代政治的课题。”^{[5]49}教权与王权的二元走向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并非一种延续,而是一次蜕变与重生。此外,中世纪虽然从一定意义上是“二元雏形”,但其以教权与政权两条绳索交织的控制方式使“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是私人领域的特性”、“在中世纪,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是同一的”^{[6]284}。基于此,得出古希腊时期、古罗马时期、中世纪国家与社会的演绎变奏,大体上经历了“一体复合—初步划分—‘二元’雏形”的变迁历程,但总体上仍未跳出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的模式范型。

考察东方社会,“家国同构”是君主专制时期最为典型的社会格局。家国同构即“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国”的缩影,家与国之间的“社会”无从发展,淹没于家国的同构格局中。“从精神义理上说,血缘社会法则同化了国家,因而‘国家被社会化了,由家而国;而从政治权力上说,国家吞噬了社会,因而社会被国家化了,‘国’居‘家’之上。’这是一种使国家的政治权力处于至上地位的社会与国家的‘对立统一’。”^[7]不难看出,家族、宗族、国家的三位一体在君主专制时期使国家与社会实现了高度同构。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在教条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判定下,加之期待革命的幸福承诺快速兑现的急切心理,这一时期各国纷纷走上了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即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政策,由此将国家权力机构与社会结构再次推向了高度胶着的状态。社会的自主性再次走向“夭折”,国家与社会则在君主专制时期、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留下同构一体的东方印证。

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下政治认同呈现附魅与混沌化的表征。一是个人特性的遮蔽。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存在即“有意义的”展开,是向“澄明之镜”的解蔽与敞开,然而“让存在总是在个别行为中让存在者存在,对存在者有所动作,并因之解蔽着存在者;正是因为这样,让存在才遮蔽着存在者整体。让存在

自身也是一种遮蔽。在此之在的绽出的自由中,发生着存在者整体之遮蔽,存在着遮蔽状态”^{[8]227}。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下自我特性既有“未经揭开”之遮蔽、“掩埋”之遮蔽,也有“伪装”之遮蔽,个体在城邦共同体、教会共同体或宗法共同体下往往秉持着“纲常”“天道”等法则,未能呈现“存在的敞开”。在政治认同上则被神秘因素或绝对权威所“绑架”,呈现附魅与混沌化表征。二是他者世界的规约。认同是内蕴“他者”之维的认同,“他者”从文化哲学上分析,“既指主体某种欲望和情绪的投射,是“另我”,也指伦理化的,体现‘自我’对‘他者’的责任与义务,是绝对化的,不能还原、同化为‘自我’的‘他者’。”^{[9]130-132}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下,个体在‘另我’的维度是规约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另我”是严格地绑定在王权或教权的“十字架”上。“他者”的维度也是规约的,在血缘、地缘、宗缘的依出身而决定公共事务决定权的法则下,“他者”世界的参与与介入也即被严格地限定。他者世界的规约使政治认同在这一时期未能从真实的“他者”意象性关联中反观“自我”,其认同亦是附魅与混沌的。三是权力权威的强力。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实是无社会,惟有国家的同构一体,“绝对化的权力权威”是其最显著的符号,“一切文化、经济,只能活动于此一机器之内,而不能跃出于此一机器之外。”^{[10]92}政治认同则成为一种异化了的以政治权力导向为鹄的单向度强制性之河的潜流。

“谁之认同”“为何认同”“如何认同”是认同研究不可回避的三根主线,“谁之认同”更是研究逻辑起点与归属原点,因此解读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下政治认同附魅与混沌化的表征,从“谁之认同”探趣,不难得出,“非我”式的认同主体是其认同表征的主体样态。“非我”是费希特提出的范畴,即“自我”的对立物或对立面,是对“自我”的否定,作为“我”的对象世界,在被占有、利用和改造的过程中,处处会打上“我”的印记,成为“我”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显现(“自我”本性的确证)。然而在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下,“非我”是主体的扭曲的暴力,是“一(权力)”的化身下被支配、被占有、被征服、被暴力甚或被消灭的否定的“自我”。“非我”只有在万物有灵、图腾习俗、巫术信仰等神秘因素或家族、城邦、种姓、门第、行会、教派等群体性“人格”下在以“人的依赖关系”的组合中寻求自我的幻象。“公共意志”的操控、绝对君权的命令、绝对教权的威慑足以将“自我”粉碎。“非我”式的认同主体在城邦、教会或君权掌控国家所有经济资源的绝对经济控制下“顺应”地认同;在“家国同构”、教权、王权统合的社会格局中“自然”地认同;在“纲常伦理”、“权力至上”的绝对文化的理念统治下“服从”地认同。然而“顺应”认同、“自然”认同、“服从”认同均非理性主体的自觉认同,而是“非我”式的认同主体在“一(权力)”的化身下混沌不清的、附魅的、蕴含克里斯玛型因子的认同。简言之,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下社会自主性的缺失、主体性的匮乏、权力与强力的覆盖,“非我”式认同主体是认同表征于附魅与混沌化的阿额琉斯之踵。

二 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政治认同的出场与宰制化

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即国家与社会从同构一体的二元融合中走向分化与分离,二者的界限有所廓清。揆诸西方社会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的进程演绎,不难发现,呈现启蒙运动时期“社会中心论”、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本体论”、马克思的“对立性”与“同一性”并存的变迁历程,然而无论是持何种倾向,国家与社会已无可疑义地从同构一体迈向了有限分离。东方社会自民族国家的确立、市场经济的开启、世俗化进程的推进国家与社会亦呈现有限分离的时代印迹。

考察西方社会,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世俗化”、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现实要素的冲击下,“中世纪‘现实的二元论’逐渐向近代‘抽象的二元论’转换”^{[7]284},随着市民阶层的形成、资产阶级的崛起,“现代欧洲社会思想的核心”向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观念迈进,并“规定了欧洲国家的政治日程”^{[11]64}。然而国家与社会的有限分离并非直线发展的,而是呈现“社会中心论”“国家本体论”“对立

性”与“同一性”并存等不同的理论构想与现实镜像。启蒙运动时期,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从天赋人权出发,在“人对人的战争状态”、田园诗般的“诗意”状态、先天的“平等”状态等不同的自然状态构想中提出了社会契约论的解读,即“社会先于或外在于国家”,国家受社会的制约。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这一经济学的解读更是为“社会中心论”者注入了实质性支撑,此后戴雪、潘恩、杰斐逊、汉密尔顿等思想家也以此切入论证在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基础上社会的有限性与民主宪政建构的必要性。黑格尔则另辟新径,提出“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12]309}，“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12]253}，市民社会普遍存在的非正义、不平等使国家的干预是必要且正当的。然而黑格尔的“普遍国家”思想则极易滋生“专制主义”的土壤。马克思立足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视野,提出国家与社会“对立性”与“同一性”并存的论断。“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13]189}，鲜明地阐释社会对国家的优先性,然而国家与社会并不只有对立,其统一面则体现在国家从社会中分离出将不同调和的矛盾、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共利益为旨归,最终回归于社会,达至与社会的统一。无论是启蒙运动时期“社会中心论”、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本体论”,亦是马克思的“对立性”与“同一性”并存都是基于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的现代逻辑起点上的探究与思考,它推进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二分及互动建构的可能。然而国家与社会的有限分离也并非一帆风顺,当前国家社会化与社会国家化的再次融合、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对社会的侵蚀等现实镜像即是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后的当代风险。

管窥东方社会,自民族国家的确立、市场经济的开启、世俗化进程的推进国家与社会亦呈现有限分离的时代印迹。东方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其后发性,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的理论探究不及于西方社会,更多是在西方“普遍性谋划”的宏大叙事中的步步追赶。自国家与社会分离进程的开启,丹尼尔·贝尔所言说的不同领域服从于不同的轴心原则的现代性紧张逐步显现,经济技术体系围绕效益轴心原则、政治体系以权力为轴心原则、文化体系以价值为轴心原则,真正走向“抽象的二元论”的转换。国家与社会的有限分离使“铁板一块”有所松懈,政府也由“集权”走向“分权”,转变运作与治理方式;市场则由以权力为中介调控分配资源转向以货币为中介的效益本位,实现商品、劳动者与资本的自由流动与组合;社会活力竞相迸发,自主性增强,逐步发挥对国家权力的参与、监督、制约等功能。然而国家与社会的有限分离“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社会利益分化和资源分散水平不高、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不力,社会的自主自治自律性较差,加之‘国家主义’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14]221}等因素,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建构仍有一定距离。

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的二元结构下政治认同呈现出场与宰制化的表征。一是个人特性的觉醒与困惑并存。在西方“天赋人权”的权利观念冲击下,个体权利意识彰显,“主体性的退隐”向“主体性的黎明”一路高歌猛进,然而在权利不证自明的先验性预设下,共同体成为实现个人权利的“工具”意义上的联合,价值世界陷入“诸神争吵”的中立,“连根拔起”的一代“生活在碎片之中”(鲍曼语),成了“无根”的“原子式”的个人,也印证着马克斯·舍勒深刻寓示的“价值颠覆”特性——“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像当前这样,人人对于自身这样的困惑不解。”^{[15]57}政治认同呈现出场与宰制化的表征。二是他者世界的延展与异化并存。市场经济是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的经济基础,“利”也即得到认可与放大。欲望和情绪投射的“另我”的他者维度得到延展,消费主义的蔓延、物化的堆积都是欲望与情绪投射表达的另意表征。然而“现代权利社会中,物上所承载的精神纽带已经消失,物的衡量完全用货币计算,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精神联系被瓦解,只剩下货币化的人与物的关系”^[16]。“欲望着他者的欲望”(拉康语)、“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使“另我”的延展陷入新一轮的宰制。工具性视域的现代社会的联结、精神价值的虚空、“物化”的泛化,也使伦理化的“自我”对“他者”的责任与义务这一他者维度的异化,一切已“幻

象”化、“符号”化、“工具”化,陷入普遍的信任危机与责任缺场。三是权力权威的遵从与调侃并存。国家与社会的有限分离,使社会从绝对的权威与绝对的强力下获得了自主空间,社会自主性有所生长,但国家与社会互动建构的不足使个体再次陷入“不拒绝的接受”的犬儒心态,呈现“过客心态”与“游民化倾向”,权力权威的遵从与调侃并存。“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7]4}

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的二元结构下政治认同的出场与宰制化,从“谁之认同”的主体探源,不难发现,“自我”式的认同主体是其认同表征的主体样态。在“人的依赖性”向“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转型的社会形态中,认同主体的自主意识与自觉意识有所彰显,然而在不证自明的“自我”式的权利预设下,“(权利话语)也导致了对于独立而张扬的形式化的偏好,对于责任的近乎失语,对于个人独立和自我满足的过度忠诚,通常在无视市民社会中间群体的情况下对个人与国家的关注,毫无愧意的偏斜等。”^{[18]418}个体的认同也呈现实在的自我与自我的非实体性的理论内部与心里内在的紧张。“实在的自我(即构成个人的一种先天的、自我确认的本质)的角度界定的认同,笛卡尔的‘我思’、康德、胡塞尔的超越的自我从不同层面论证认同性是某种基本的、实在的、统一的、确定的东西。自我的非实体性(休谟),或者将自我和认同性看作是一种有关存在的规划,一种真实个体的创造,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论证认同性的创造成了每一个体的一种有关存在的设计。”^{[19]393-394}实在的自我与自我的非实体性的争论也一定程度体现着在更新的、转瞬即逝的现代性经验中认同主体的出场与宰制化的双重可能与风险。个体的政治认同也在“断裂社会”“被围困的社会”“个体化社会”“风险社会”等矛盾与紧张中建构与解构、脱域与嵌入、分化与整合,一面是“理性化的、官僚主义的、消费的大众社会和媒体文化中个性的均一化”,另一面又是“片断的、支离破碎的、游牧式的消散与离散”^{[19]396-397}。简言之,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下自主性与依赖性并存、集中与离散并存、一元与多元并存的双重编码,是“自我”式认同主体下认同表征于出场与宰制化的深刻根源。

三 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政治认同的内生与有机化

从元哲学解读,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发展到极致则可能推向“权力至上”的国家主义或“社会至上”的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是滋生“极权专制”的土壤,无政府主义则是滋生“涣散自为”的土壤,它们都是基于人性的乐观估计、二元化的思维与“零和博弈”的计算的偏见思想所造就,都不是国家与社会的最佳状态。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即国家在法治与理性的治理逻辑下、社会在自主、自治、自律的发展逻辑下相互形塑、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相互纠错的互动生态。马克斯·韦伯的“合法性”理念、伊斯顿的“扩散性支持”、普特南提出的“社会资本”、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等都隐喻着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的内蕴意涵。

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从应然视域解读,内蕴三个面向:一是分立而不对立。历史经验已证明,国家与社会的同构一体易导致“总体性社会”“权力专制主义”,不利于社会自主性的生长。国家与社会的两者对立则导致“松散性社会”、“零和”博弈困境,因此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是扬弃并超越与国家“对立”为始点的社会构建,分立而不对立,从“零和”博弈走向“非零和”博弈,推进国家宏观治理与社会自主自治的相互形塑、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相互纠错。二是归位而不越位。“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强社会”的排列组合隐喻国家与社会的内在张力与尺度,归位而不越位即国家与社会在各自的临界值内推进相互的互动与完善。国家层面的归位而不越位,借鉴迈可·曼(Michael Mann)的界说,即国家拥有强大的基础性权力,而非专制性权力^{[20]18}。社会层面的归位而不越位,即拥有自身的自主能力,而非僭越能力。自主能力指社会能在国家权力之外获得自主发展的空间

与权利。僭越能力即超越自身的界域范围,渗透与侵入于国家自主领域的的能力。三是全面而不片面。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不仅是国家与社会简单的二维图式,而是国家、市场、社会、国家与社会间公共领域等多维面向的图式,仅有国家与社会,而无市场的推动则极可能陷入“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的形态;仅有国家与社会,而无公共领域的发育,则极可能陷入公共权力领域吞噬私人领域或私人领域消泯公共权力领域的畸态。正如有学者言:“人类政治文明演变的基本轨迹,从暴力政治转向协商政治,从权力政治转向权利政治,从无序政治转向有序政治,从垂直政治转向平面政治。”^[21]分立而不对立、归位而不越位、全面而不片面的三维内涵也与人类政治文明演变的基本轨迹相吻合。

在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的哲学诘问下,探趣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的当代实现,不难得出,公共领域的现代构建、权力与权利的现代转换、输入与输出的现代平衡是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的可能路径。一是公共领域的现代构建;依据哈贝马斯在1961年撰写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的论述,公共领域是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缓冲场”,也是公共意见、公共舆论、公共理性生发的“强磁场”,公共领域是在辩论与探讨意义与价值中推进社会整合与群体认同的场域,在公共领域的主体参与本身即是对政治秩序认可的表达方式。公共领域的现代构建是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的必要场域。二是权力与权利的现代转换;霍布斯、洛克、卢梭均从“社会契约”的视角解读权力的正当性来源,政治权力、社会权力、个体权利形成了权力与权利的转换序列。从此可推知良性的转换谱系应是政治权力得到社会权力的支持、社会权力获得个体权利的赋予,由此形成自下而上的权力制约序列与自下而上的权利转化序列,在权力与权利的现代转换中既推进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也实现权力的制约与权利的转化的二者统一。三是输入与输出的现代平衡。依据戴维·伊斯顿、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的政治系统论解读,输入、转换、输出是政治系统内体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三个阶段,政治输入即“公众对政治体系的要求与支持”,政治输出则是“系统内当局履行的决策和行为”^{[22][276]}。输入与输出的不平衡可能陷入“专制性权力”亦是“合法性危机”,输入与输出的现代平衡既是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实现的条件,也是政治系统良性运行的基础。

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下政治认同呈现内生与有机化的表征。一是个体身份认知的清晰化。无论是“人与人的依附关系”或是“人对物的依赖关系”,都使个体陷入“主体性困境”或是“物化”谜局,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下个体通过政治参与、公共交往、协商对话超越“无根浮萍”式的虚幻、走出与君王相对应的“臣民”身份、走出意识形态伪饰的“人民”话语、走出精英主宰下的“大众”言说,而走向公民社会中的“公众”身份,以公众式的主体明晰个体的权利与义务、责任与担当,在“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摆钟下实现人的自由与自然权利的内在平衡。二是他者社会意识的确证化。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的一元结构抑或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的二元结构下政治认同呈现附魅与混沌化抑或出场与宰制化的表征,在此政治认同表征镜像中个体对他者社会则是公权力强制下的“异化”抑或私密性狂欢下的“冷漠”,“意义的共同体”即告崩溃,“构成性的善”也即缺席。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则“在锡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获得了平衡,他者社会中找寻着“相互的承认”、在“最大公约数”的利益共识中寻求自我的定位与群体的边界,确证群体符号与增强集体观念。三是权力权威认同的理性化。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下个体对权力权威的认同既不是无主体的盲从、也不是远而避之的冷漠,而是寻求与公共权力互动合作下的理性认知。个体不是受指令的“受众”、也不是受蛊惑的“人民”,而是参与公共生活、赋予公共理性的“公众”,个体在自觉认知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集体观念下理性地认知权力权威,对权力权威形成理性而非盲动的认同。

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下政治认同的内生与有机化,从“谁之认同”的主体探源,不难发现,“他我”式的认同主体是其认同表征的主体样态。桑德尔曾提出三种不同性质的共同体:“工具性共同体、情感性共同体和构成性共同体”^{[23]150-151}。工具性共同体是基于手段、功利构成的共同体,情感性共同体是基

于血缘、情缘、亲缘构成的共同体,构成性共同体则是建立在平等关系意义上的公民共同体。不难发现,构成性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的生长境遇,而“他我”式的认同主体是构成性共同体得以实现的主体基础。“他我”即超越同一性、单一性的,内蕴“非同一性”“异质性”的有责任、有担当的主体。列维纳斯、德勒兹、福柯、德里达等都对“他我”有过论述,“他我”是伦理的源点,是从“自我”的个体自负中跳出,以承认“另一主体”,且以“责任先于自由”为判断的主体样态。马克思也曾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在人的本质的言判中精炼地表达了“他我”式认同主体的本然意涵。简言之,“他我”式认同主体是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下认同表征于内生与有机化的主体样态。

参考文献:

- [1] (荷兰)克里斯·洛伦兹. 比较历史学理论框架的初步思考[J]. 山东社会科学, 2009(7): 40-50.
- [2] (美)霍兰·萨拜因. 政治学说史(上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颜一, 秦典华,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4] (古罗马)西塞罗. 论共和国·论法律[M]. 王焕生,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 [5] (美)沃特金斯. 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M]. 李丰斌,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7] 鲁品越. 中国历史进程与市民社会之建构[J].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 1994(夏季卷): 173.
- [8] 海德格尔选集[M]. 孙周兴,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 [9] Simon. 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M]. London: New York, 1996.
- [10] 徐复观. 两汉思想史(第1卷)[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11] Robert Fine, Shirin Rai. Civil Society: Democratic Perspectives[M]. London, Portland: Frank Cass&Co. Ltd., 1997.
- [12]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4] 马长山. 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15] (德)马克思·舍勒. 资本主义的未来[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16] 侯猛. 权利观念的中国化——从民族国家选择到社区伦理挑战[J]. 法律科学, 2011(5): 3-12.
- [17] (美)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M]. 章艳,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18] (美)玛丽·安·格伦顿. 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M]. 周威,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19]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 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20] 张静. 国家与社会[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 [21] 桑玉成. 现代政治文明的源起及其演进[N]. 文汇报, 2003-12-28.
- [22] (美)戴维·伊斯顿.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 [23] Sandel M J.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责任校对 莫秀珍)